

第一编 先秦散文

概 述

散文可以说起源于原始的结绳、刻木记事，结绳、刻木的事件要想得到流传，需要辅以口头传述，等有了文字，把口耳相传的事件记录下来，这就是散文。

我国的散文最早产生于什么时代，现在无从确考。不过我们认为，夏朝开始进入青铜器时代，进入奴隶制社会，并且积累了天文历法知识，应当是一个有文字的王朝。如果说夏朝十七王的世系得以流传，还可以依靠结绳、刻木的方法做到，那么春秋战国时人（如《左传》襄公四年和《天问》、《离骚》等）所讲述的那样繁复的夏代史实，不是依据曾经有过的文字记载资料，则是不可想象的（《左传》襄公四年所说是依据《夏训》）。《尚书》中的《甘誓》，《墨子·明鬼下》引用它称为《禹誓》，文字大致相同，有人以为出于后人之手，有人以为是夏代文字而后人有改窜。《左传》引《夏书》十余次，《国语·周语中》引用《夏令》，《孟子·梁惠王上》引用《夏谚》这些《夏训》、《夏书》，《夏令》、《夏谚》等等，很难说都是出于后人的造作。阮元曾说，古人无笔墨纸砚之便，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同为一言，转相诂语，恐有愆误，“必寡其词，协其韵，以文其言，俾得易于记诵，无复增改”（《肇经室三集》卷二《文言说》）。《左传》所引《夏书》有一些只是片语只言，但也可以确

定其中韵语约占一半，《墨子》所引《禹誓》，《孟子》所引《夏谚》都是韵语，很可以证实阮元之说。夏朝应该是产生了散文的。

商朝在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以后出现了奴隶制的兴盛时期，农牧业、手工业都很发达，青铜器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工艺水平极高。商朝贵族物质丰富，生活奢侈，音乐歌舞高度发展。

《礼记·表记》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比起夏朝的朴野，殷商自可以称“文”。这是一个神权统治的时代，“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同上），统治者极端迷信，阴晴风雨，祭祀殉葬，出行田猎，事事占卜，卜官把占卜的事件和结果记录在龟甲兽骨上，这就是卜辞。因为出土的卜辞极多，涉及面广，为我们提供了殷商时代丰富的历史资料。这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不容争议的最可靠散文。卜辞之外，也有少量记事刻辞，长者不过百多字。卜辞能够明白达意，有的已具备了记叙散文的要素。殷商的青铜器上开始有了铭文，少的一个字，最多的不超过五十个字。内容多是记述得到殷王赏赐，作器铭以为纪念。我们不认为卜辞、铭文可以代表殷商散文的水平。《尚书·商书》的《盘庚》三篇，学术界都认为，虽然带有某些后代文字的色彩，仍然是很可靠的殷代文献，它所表现的神权思想与卜辞一致，而篇幅颇长（上中下三篇近一千三百字，上篇近六百字），语气传神，有形象的比喻，表达水平比卜辞、铭文高得多。

周灭殷，引起了政治、思想上的一次变革，“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殷周制度论》）。周人夺取政权以后，感悟到“天命靡常”、“天不可信”，战战兢兢，唯恐坠失天命，于是提出了“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主张，由殷人的一味迷信鬼神转向于重人事，制礼作乐，分封诸侯，实行宗法等级制度，采取了一套巩

固政权的政治措施。“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礼记·表记》），就是指此而言。这些思想和制度对后代产生了很大影响。

西周时代的文献比较丰富，除《诗经》的“周颂”、大小“雅”之外，有《尚书》中的《周书》及铜器铭文和《周易》。今存《周书》中的大部分文章是西周初年的可靠文献，表现的是周人的新思想，但是文字仍然像《盘庚》一样难读，《大诰》比《盘庚》还艰深。其中《无逸》思想杰出，有论点，有论证，层次清楚，首尾完具，是一篇恳挚的训诫文字。《顾命》写成王之死和康王即位，礼仪隆重，场面宏大，铺叙井井有条，是一篇成功的记事文章。可以认为，《尚书》标志着我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西周是铜器铭文的鼎盛时期，长铭将近五百字，或记言或记事，如记训诫，记战功，记封赏以及狱讼、土地交易等等，多方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足以补《尚书》的不足。偶有较为生动的叙事，也较有感情色彩。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用韵铭文。周原也出土了西周前期的卜辞，文字表达水平无可称道者，值得注意的是《周易》中的筮辞。《周易》筮辞上起殷商末年，编定的时间不早于春秋中期，虽然语言零散，但是可以窥见古代的一些社会生活，部分筮辞和六十四卦的排列，表现了编者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大量运用象征手法，能表现真切的情景，表达技巧比《尚书》有进一步提高。

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导致生产关系的改变。鲁国的“初税亩”（《春秋》宣公十五年），透露出奴隶制瓦解和封建地主制诞生的信息。此后韩、赵、魏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各国先后实行变法，相继确立了地主制。与此相关的另一方面，则是王室衰微，礼坏乐崩。大国争霸，春秋一代，“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

意识形态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如西周以来远鬼神、重人事的观念发展为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到战国时期更扫除鬼神观念而代之以人治、法治的主张。孔子兴办私学，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余人，“皆异能之士也”，这对于打破世袭贵族垄断文化的局面和士阶层的形成，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七国争雄，合纵连横，各国统治者都寻求兼并统一或自强自立的方策，争相罗致人才，战国四公子和秦相吕不韦均养士至三千，齐国稷下尊各派学者为列大夫，不治而议，亦招致数百千人。这为士人从事政治和学术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士的地位空前提高。“士贵耳，王者不贵”，“得罪一士，社稷其危”，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思想和言论。策士凭借口舌奏功，折冲尊俎，擒敌户内，“转危为安，运亡为存”，可以平步青云。由于传统思想崩溃，思想界也呈现出大解放的形势，如何治理国家，如何统一天下，是当时面临的大课题，各派学者争抒所见，竞言变革，议论风发，无所避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所仅见的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墨、道、法、阴阳、纵横、兵、名、农、杂，学派蜂起，人才辈出，哲学、政论等学术著作，丛生叠现。他们相互驳难，各是所是，各非所非，但是也相互启发、吸收，“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于是在中国文化史上展现出一个最富于创造力和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产生了大量新思想、新观点，如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荀子“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论，《老子》、《易传》丰富的辩证法，墨家成体系的逻辑学，韩非子主张变革的历史观，《孙子》杰出的军事学等等，都是我国文化史上的珍贵遗产。

诸子的哲理散文著作，举其要者，有儒家的《论语》、《孟子》、《荀子》及《易传》、《礼记》，墨家的《墨子》，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商君书》、《韩非子》，杂家的

《管子》、《吕氏春秋》，兵家的《孙子》，名家的《公孙龙子》等等。这些著作涉及哲学、政治、伦理、法律、宗教、军事、经济、教育、逻辑、文论等各个方面。就文学价值而言，《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成就最高 它们都是在论辩和斗争中产生，因此文章富于激情，文笔犀利，气势充沛，宏博壮丽。它们又善用文学的手法，运用比喻、寓言和历史故事说理，因此极富形象性。具体讲，《孟子》和《庄子》文学性最强，特别是《庄子》，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善于“指事类情”的表现力，奇异斑斓的浪漫主义色彩，使它雄踞于诸子之上。而《荀子》和《韩非子》析理的成就最高。

当时的史书也十分丰富。《国语·楚语上》载，楚国申叔时谈教授楚庄王太子八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的“春秋”、“世”、“令”、“语”、“故志”、“训典”五类，都是类别不同的史书。墨子见过“百国春秋”，曾经引用周、燕、宋、齐的《春秋》（《墨子·明鬼下》），孟子提到晋之《乘》，楚之《梲杌》鲁之《春秋》（《孟子·离娄下》），但是这些著作流传下来的很少。早期的史书，不过是备忘录性质的“历谱谍”或大事记，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史家产生了历史观念，他们通过记述废兴成败的历史事实，要“惩恶而劝善”，“耸善而抑恶”，而统治者要从中汲取经验教训，策士、学人要储积游说、著书的资料，于是有历史著作的勃兴。鲁《春秋》是鲁国史官写的编年史，经过儒家的修订，进一步表现出尊王攘夷的鲜明倾向，并且“不道鬼神”，文字简要，明白晓畅，与《尚书》的“佶屈聱牙”迥乎不同，遣词造句，属辞比事，多含刺讥褒讳之意。此后有所谓“《春秋》三传”，《公羊传》、《谷梁传》着重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也有些比较生动的记事，传授于战国，写定于西汉。《左传》叙事虽以《春秋》为纲，也解释《春秋》，但不受《春

秋》限制，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完整的编年史，思想出色，内容丰富，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春秋二百多年间的社会面貌，是宏伟而优美的历史画卷。长于记述战争和行人辞令，情节曲折生动，人物形象鲜明，在史传文学中，只有司马迁的《史记》和它前后辉映。《国语》与《左传》有相近的思想倾向，有生动的情节和人物的描写，但是偏重记言，多发议论，思想、文学成就都不及《左传》。《左传》、《国语》的成书时间比较晚，《左传》成书约在公元前四世纪六十年代前后，已入战国中期，所使用的史料当然是出于春秋时代。《战国策》与《左传》不同，《左传》主要写世袭贵族，重礼尚文，《战国策》主要写策士、纵横家，记述他们的活动和游说辞，表现他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战国策》的游说辞是行人辞令的进一步发展，铺张扬厉，辩丽横肆，气势夺人，有极强的鼓动性和说服力。《战国策》的叙事更多小说色彩，情节富于戏剧性，人物神采飞扬，在史传文学中也占有突出的地位。需要指出的是，纵横家及其文风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章学诚说：“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比兴之旨，讽谕之义，固行人之所肆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九流之学，……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纵横，所以文其质也。”（《文史通义·诗教上》）纵横家是游说的行家里手，经验丰富，而儒、墨、法各家推行自己的主张，也离不开游说，因此自觉不自觉地受到纵横家游说辞的浸染。孟子的雄辩，墨家的《公输》等文乃至宋玉的赋，可以明显地看到纵横家的影响，《庄子·说剑》、《韩非子·初见秦》、《管子·霸言》更属纵横家言。《战国策》，确实代表着一代文风。史传散文中还有一部《晏子春秋》，也不乏生动的描写，是先秦唯一写一人之史的著作。

先秦散文中只有赋是纯文学体裁。战国后期，在诗歌、散文

发展的基础上，文体有了新的发展，如楚辞中产生了介于诗、文之间的《卜居》、《渔父》那样的作品，而宋玉和荀子更综合多种文体，特别是借鉴楚辞、说辞和谐隐，推出了便于铺陈咏物的一种新文体——赋。宋玉的赋，刻画细致，辞彩华丽，艺术性很高，它为先秦散文史点染了一笔艳丽的色彩，并且开了汉代大赋的先河。

我们先秦散文为四类，一类是卜筮散文，即殷商卜辞和《周易》卦爻辞。“巫以记神事”，它们出于巫卜之手，是古人迷信的产物。从文章角度说，都属于应用文。人类早期的散文大约都是应用文。第二类是史传散文，其中的铜器铭文和《尚书》中的文告、演说辞，也属于应用文。但是《春秋》以下，通过记述史实定是非、寓褒贬，则不可视为应用文。《尚书》中的《金縢》开始有了人物传记的因素，《左传》完整地记录了很多人物的事迹，而“郑伯克段于鄢”、“晋公子重耳出亡”更打破编年的体例，集中描写人物，已经是人物传记的写法，《战国策》的某些文章和《晏子春秋》已经是人物传记，所以我们称之为史传散文。第三类是哲理散文，即诸子之书，称“哲理”比称“诸子”显得明确、具体。这样称说并非出于我们的发明。第四类是辞赋，辞指楚辞，本不属于散文的范畴，因为要论述楚辞中的《卜居》、《渔父》，所以就与宋、荀之赋，统而称之了。

章学诚说：“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文史通义·诗教上》）认为战国时代具备了后世的各种文体，自然有些夸张，不过我们上面所说应用文、记叙文、说理文、赋，已是四类散文，而史传散文又有编年体、国别体和记事、记言之分，在哲理散文中，又有语录体、对话体、专题论文及立论、驳论、经说体等等。而哲理散文中的寓言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实际是后世小说的蓝本。所以章氏之

言也是有一定理据的。

上文说过，先秦散文大都是经国济世之文，作者们以高涨的热情，积极参与政治，争相制订治国方略，揭露腐朽的统治者，抨击社会弊端，同情人民疾苦，鼓唱民为邦本，他们几乎个个是社会改革论者。其中儒家、道家的《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对中国知识分子、对作家诗人有极深广的影响，儒家思想更支配中国两千余年，以至影响到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的形成。因此，我们研究先秦散文，不可忽视对思想内容的研究。

先秦散文是中国散文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中国古代散文的源头。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特殊的历史条件，造就了一批富于创造性的理论家和散文家，使先秦散文飞跃发展，在战国时期已屹然树起了一座高峰，不仅作家、作品数量众多，而且个性、风格不同，异彩纷呈，光耀夺目，《孟子》、《庄子》、《左传》、《战国策》是其中的代表，它们是古代汉语的标准作品，是我国古代散文的典范和楷模。后代的散文家、历史家，无不受到它们的哺育和熏染，后代的小说、戏剧也无不从它们学习技巧，吸收营养。

第一章 卜筮散文

文字出现以后，产生了散文。最初的散文都是应用文，首先是用于卜筮和记录史事的文字。鲁迅说：“连属文字，亦谓之文。而其兴盛，盖由于巫史乎。巫以记神事，更进，则史以记人事也，然尚以上告于天；翻今之《易》与《书》，间能得其仿佛。”（《汉文学史纲要》）这里我们先谈谈我国文字的产生与演进，然后谈卜筮散文。

第一节 文字的产生及其演进

有了人类，就有了语言。然而语言不能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传于异地，留于异时”。“结绳而治”，刻木记事，也不能适应日趋复杂的社会生活。经过漫长的历史时代和初民的不断摸索、积累，终于创造了记录语言的工具——文字。散文，就是文字发明以后应用于文献记录的产物。

我国文字（这里指汉字）起源于什么时代，学术界还没有一致的看法。在仰韶文化早期的陶器上，发现了许多刻画符号，距今约六千年以上。一些学者认为，这就是中国文字的源头：

那些刻画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

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子遗。……种种地下资料、现存民俗和文献记载等参证起来看，中国文字的起源应当归纳为指事与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当发生于象形系统之前。（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载《奴隶制时代》）

原始指事字一与二三 三（四）积画之出现，……是我国文字之创始。（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页九七）

有人认为那只是一些符号，并不是文字，但是认为一些数字以至天干字可能出自这类符号。

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尊上，发现了  等象形文字，距今约四千五百年。学者们认为这是文字。

可以肯定，夏代是一个有文字的王朝，这不仅由于夏王的世系（十四世十七王）完整地流传下来，夏代许多史迹为后人所熟知，而且夏代有了历法，夏朝后期的王如孔甲、胤甲、履癸都以天干字为名。《左传》等书屡次引用《夏书》、《夏训》、《夏谚》等，其中可能有可信的文字资料（有的学者认为《尚书》中的《甘誓》传自夏代）。当然，最初的文字记事可能十分简陋，比如文字中夹用图画、符号，或者只简略地写出一部分词语，像纳西族的东巴经那样，是完全可能的。

河南登封告城镇王城岗遗址和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出土的陶文，可能是夏代的文字。

江西清江县吴城发现的陶文，有五个字、七个字甚至十二个字组合在一起的，大概已经是“会集众字以成辞义”了。它的时代约当中原的中商时期。

盘庚迁殷以后，产生了大量的甲骨卜辞，还有记事刻辞、铜器铭文，广泛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这时的文字虽然还没有完

全定型，往往一字多体，但是已经相当进步，象形字变得很不象形，书刻技术十分熟练，指事、象形、会意、形声、假借，无不具备，已发现的不重复单字达四千五百以上。在可识读的约一千字中，象形字约占百分之三十七，会意和指事字占百分之四十，形声字占百分之十八（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第五章第二节）。“形声”是汉字造字法中最进步的一种，事不可指，形不可象，意不可会，都可以通过“形声”法造字。当时形声字虽然还不占优势，但是这种造字法的出现，为汉字的大量孳乳开辟了广阔的途径。西周以后，形声字大量产生。据不完全统计，西周金文的新增字中，形声字约占百分之八十，春秋战国以及秦汉，形声字更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比例增长。春秋战国时期，散文作家之所以能那样从心所欲地记事说理，表情达意，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一人著书甚至多达数万、十余万言，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的文字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表达工具。

讲文字的发展，散文的产生，不可不讲巫、史的作用。巫和史，是上古最有文化的人，卜筮散文和史传散文就是他们的作品。据说，仓颉是黄帝时史官，夏代有太史令终古，商代则确切可知有“史”、“尹”、“作册”等官职，都属史官一类。殷墟甲骨文有象形的“册”字、“典”字，“册”即串联起来的竹木简之形，“典”即双手奉“册”。周公曾经对殷遗民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尚书·多士》）就是说，殷人的典册中记录了殷革夏命的史实。这些典册必定出自史官之手。

我国古籍中盛行仓（苍）颉造字的说法。《世本》说：“苍颉作书。”又说：“沮诵、苍颉，黄帝之史官。”文字是历代广大民众创造的，决不是一时一人的产物。但说史官仓颉与文字有关，则有道理，如果确有其人，他应该是文字的搜集者和整理者。

正如鲁迅所说：“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门外文谈》）

第二节 甲骨卜辞

殷墟甲骨卜辞发现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经过大规模收集、发掘和很多学者研究，取得很大成绩，形成专门的“甲骨学”。郭沫若、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精选甲骨四万余片，是著录甲骨文的集大成性著作。

殷墟（在今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是盘庚至帝辛八世十二王二七三年间的都城。“殷人尊神，率民而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殷商统治者每事必卜，甚至一事数卜，卜后由殷王亲自视兆，判断吉凶，并把卜辞刻写在龟甲或兽骨上面，所以称为甲骨卜辞。另外有少数记事刻辞。

卜辞的内容，包括农业生产、天象（风雨）、旬夕（吉凶）、祭祀、征伐、田猎、疾梦、使令、往来、婚娶等等，涉及殷王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卜辞文字简短，少则数字，多则百余字，但是已经能够达意表情。例如：

癸巳卜，𠩺 贞：旬亡咎？王占曰：“有崇，其有来艰。”
 乞（迄）至五日丁酉，允有来艰，自西。𠩺 告曰：“土方正（征）于我东鄙，灾二邑。邛方亦牧我西鄙田。”（《卜辞通纂》五一二）

——癸巳日占卜，𠩺问卦：十天之内没有灾殃吧？王视兆后判断说：“有灾祸，将有患难来临。”到第五天丁酉日，

果然从西方传来发生祸患的消息。泚 盛报告说：“土方入侵者攻打了我们泚的东部边境，劫掠了两个邑。邛方也入侵了我们西部边境的土地。”

（破折号后面的文字为意译。下同）

这是形式完备的卜辞，分为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四部分。作为叙事文来看，也可以说略具规模，对于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作了交代，初步具有了叙事文的要素。又如：

癸酉卜，亘贞：臣得？王占曰：“其得唯甲乙。”甲戌，臣涉舟延 召，弗告。旬有五日丁亥幸（执）。十二月。（转引自胡厚宣《甲骨文所见殷代奴隶的反压迫斗争》，载《考古学报》1976年第一期）

——癸酉日占卜，亘问卦：逃跑的奴隶抓得到吗？王看了卜兆说：“抓到他，只能在甲、乙的日子。”甲戌这天，那个奴隶乘船过河的时候，陷在河里，耽误了时间，却没有人来报告，直到第十五天丁亥日，才把他抓住。这件事发生在十二月。

这是讲抓捕逃亡的奴隶，不仅有时、地、人、事，而且写了原因、结果，把事情发展的曲折过程也写出来了。又如：

戊午卜，争：水其馭兹邑，其为我祖辛佐王，其家祖乙佐王？（《小屯乙编》三一六二）

——戊午日占卜，争贞问：洪水将要淹毁这都邑了，是我家祖辛保佑王，还是我家祖乙保佑王？

甲申卜，穀贞：妇好冥（娩）， 妣（嘉）？王占曰：

“其唯丁冥，**𠄎**；其唯庚冥，弘吉。”三旬又一日，甲寅，冥，不**𠄎**，唯女。（《殷墟文字丙编》二四七）

——甲申日占卜，**𠄎**问卦：妇好分娩，能使人可心吗？王视兆以后说：“如果在丁日分娩，就好；如果在庚日分娩，更是大吉大利。”过了三十一天，在甲寅日分娩了，不好，因为生了个女孩子。

不仅止达意，这简直是表情了。大水要冲毁商邑，切盼先王保佑，使用了“我家”二字，充分表现了情急求助的口吻。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屠次率大军出征，武丁希望她生儿子，却生了个女儿，“不**𠄎**，唯女”，表达了很重的懊丧情绪。

其次，有的卜辞能用简练的语言，表现出真切的情景。例如：

今兹云，雨？（《殷虚书契》六·四三·四）

——现在天空这云，要下雨吗？

日若兹敏（晦），唯年咎？（《卜辞通纂》四四八）

——日光这样的昏暗，会年头不好、发生灾祸吗？

贞人面对当时遇到的自然现象，使用表示近指的“兹”字，能生动地再现占卜时的真切情景，使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又如：

王占曰：“有崇！”八日庚戌，有各云自东**𩇛**母，昃，亦有出虹自北饮于河。（《卜辞通纂》四二六）

这是说，在占卜的第八天庚戌日，天空出现了云彩，中午过后，又有虹从北方出来，伸头到河里去饮水。在甲骨文中，“虹”字

“像两头龙蛇之形”，与《山海经·海外东经》所说“𪚩𪚩（即“虹”）”“有两首”是一致的。《艺文类聚》卷二引《黄帝占军诀》说“有虹从外南方入饮城中者”，《穷怪录》也说“首阳山中有晚虹下饮于溪泉”，都与这里所写的景象相合。这条卜辞不仅涉及神话传说，而且已经是生动形象的景物描写了。

卜辞已经能够比较具体地写明多种情景，表达方式也有变化，以天象方面为例，举凡风（风）、云、雨、雪、霰（落雨）、霰（零）、雷、霖、霁、霾、启（昼晴）、星（夜晴）、晦（阴）、易（阳）、霍（雾）、画（晕）、易（暘，《说文》：“日覆云暂见也。”）以及日月蚀等等，都出现了。仅就下雨而言，卜辞中就有种种十分具体的形容，例如以下各条：

乙，允（果然）雨，少。（《殷契粹编》八一六）

帝令多雨？帝不其令多雨？（《殷墟文字乙编》‘五三二九）

其遘（遇）大雨？其遘小雨？不雨？（《殷契粹编》八〇七）

不緝（茸）雨（毛毛雨）？（《殷契粹编》七二〇）

今夕不亦盧（和调）雨？（《殷契粹编》七九五）

今丁其沚（延）雨（继续下雨）？（《卜辞通纂》三七八）

今夕其雨，疾？（《殷契佚存》五六五）

其亦烈雨？不亦烈雨？（《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四一九）

今日奏舞，有从（纵）雨？（《殷契粹编》七四四）

有时候对于下雨的情状还作细致的记述：

旬四日丙申，晨雨，自东，小采既。丁酉雨，自东。旬